

##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专题

**编者按:**近些年,文学批评的重建几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持续热议的重要议题。客观来看,在当代文化格局和文学生态中,当代文学批评是一种危机化、圈子化/小众化的学术实践,在学术界内部和外部,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凌空蹈虚、强制阐释、乏力无趣,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清单上继续列举若干语汇。那么,影响或钳制当代文学批评的因素是什么?从大的方面来看,权力意志、市场利益、人情伦理以及批评者的知识谱系是左右文学批评发展的四种主要因素。加上文学批评本身是一个包含多个声部的超级系统,文学批评的价值系统、理论资源、批评文风、功能定位在不同研究者那里呈现出显见的差异。这些因素使得当下文学批评众声喧哗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危机与困局。鉴于这种现状,我们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反思还是应该从批评者的自我批评与自我清理开始。本次推出的两位青年学人的专题文章,角度不同,观点鲜明,供读者参考。

# 正义与及物

## ——关于文学批评何为及当前困境的思考

沈杏培<sup>\*</sup>

**【摘要】**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正义”与“及物”的内在属性:好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在“寻美”,更是一种敢于冒犯、体现知识分子批判理性的“求疵”过程,是散发着知识分子正义的“及物”活动,是批评者“不低于”批评对象的对话与“问诊”——这是我所理解的高明、有效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的品质和向度。当前文学批评中流行的“不及物”批评形态包括“化简为繁”式义理叠加、“邻猫生子”式的伪问题、“砍头割脚”式的阉割批评模式和“求全责备”式的错位标尺判断,其共同特征在于看似充满了各种“理性”和“问题”,实是“不及物”或是非理性的胡搅蛮缠。

**【关键词】** 正义;及物;公共知识分子;“80后”文学批评

近些年,有两本书被界内研究者引用或提及的次数颇多,一本是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一本是玛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文学死了吗?》写于新世纪之初,有感

---

<sup>\*</sup>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10097。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介入性与公共性问题研究”(16ZWB009)、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基金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基金资助项目(201414)阶段成果。

于技术的巨大变革与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米勒不无悲观地指出,印刷和纸媒书籍的时代已被新媒体取代,文学也会在这股浪潮中“行将消亡”。准确地说,米勒想说的是传统文学和以印刷作为载体的文学时代即将死去。如果说米勒是在给传统文学敲响丧钟吹奏挽歌,努斯鲍姆则试图让我们从这悲鸣声中重拾对文学的信心。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中批判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经济学提供的正义标准日益成为一种重要价值,而经济学功利主义和法律经济学是以物化视角来对待人和人性的。如何纠正和补充经济学的这种偏向?努斯鲍姆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提供一种诗性正义和诗性裁判,而这种判断比经济学功利主义标准具有更多的人性关怀。尽管努斯鲍姆的理论和批评进路中有些许乌托邦色彩,但文学的诗性价值确实得到了极大的伸张。

如今,米勒的“文学终结”预言似乎没有成为现实,文学依然健在,蓬勃芜杂,野蛮生长。努斯鲍姆试图让文学(尤其是小说)在经济学的标准之外提供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和诗性正义的学术呼吁和批评实践,更让我们看到文学和批评的价值所在。我想说的是,文学不死,批评就不会亡。笔者在以前的论文中曾讨论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批判性和趣味性<sup>①</sup>,本文试图进一步指出,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正义”与“及物”的内在属性:好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在“寻美”,更是一种敢于冒犯、体现知识分子批判理性的“求疵”过程,是散发着知识分子正义的“及物”活动,是批评者“不低于”批评对象的对话与“问诊”——这是我所理解的高明、有效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的品质和向度。

## 一、文学批评是一项“寻美”和“求疵”并行,散发出正义光辉的事业

一般而言,文学批评是指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阅读、鉴赏,继而分析、阐释和评价的综合活动。文学批评需要批评家具有健全的人格、敏锐的艺术感知、明确的评判标准、清晰的评价立场——这些几乎是从事学术批评的基本认知。然而,当下文学批评看似数量可观成果斐然,实则症结多多,对批评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有学者指出当前学术批评有三大症候:一是立场上有场而无立,文坛的“场”够大,批评家主体不“立”;二是标杆上有杆而无标。批评者们人人都有话要说,时刻在抢占话语高地,而最为致命的高地之“标”少有人能及;三是学养上有学而无养。饱“学”而不养“学”,学虽有攻,但少涵养之气,造成批评者治学、为学态度的轻佻和散漫。<sup>②</sup>当下文学批评的症结当然远非这几点,我们还可以找到一大批负面词汇来描述这些问题:空洞无物、理论堆砌、文风呆板、隔靴搔痒,等等。

我理想中的文学批评首先应有正义之气。面对作家,不论名声,不论亲疏,敢于真诚发声,敢于冒犯作家作品,敢于进行冒险的批评,既赋予文学批评寻美的功能,又具备求疵的品质。美国学者波斯纳将一些学院派学者称为“学院道德家”,认为他们是一群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曾出过校园,没有教职前,不敢冒任何职业风险。有了教职,也很少冒职业风险,而从来不会冒个人风险。他们过着一种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也许稍带点放荡不羁。他们思想左翼,生活右翼,或者思想右翼,生活左翼。”<sup>③</sup>波斯纳的话语非常适合描述我国以学院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文学批评家,这些“学院道德家”的典型症候是从从事一种不冒险的写作。作为一个法官,波斯纳对这种“不冒险”的写作深恶痛绝,他非常看重文学评论的公共性作用。在《知识分子的衰落》一书中,他单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学评论家”一章,文学评论家的文学评论是他界定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11种类型之一,但在他看来,“纯美学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即便是面向普通读者写作,也不符合本人有关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界定,

① 沈杏培:《重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维度和趣味维度》,《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3期。

② 王彬、王春林等:《当前文学批评标准与方法》,《文学报》,2012年10月11日第4版。

③ [美]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译序11—12页。

因为它对于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的公共话语并无贡献。”<sup>①</sup>在波斯纳这里,他所反对的是无法与圈外的人沟通交流的充斥着太多专业术语的文学研究,他看好的文学评论家是那些有公共知识分子品质与功能的评论家类型。正因为此,他对艾略特、威尔逊、特里林评价不高,称他们为“骑墙派”,而对韦恩·布斯和玛莎·努斯鲍姆赞赏有加,其中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学批评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与功能。当然,我们知道,努斯鲍姆的文学评价标准在某些地方有些偏颇与狭隘,比如过于看重现代小说中的政治因素与批判性品性,而忽略美学意义的体认,因而,波斯纳在充分肯定努斯鲍姆的文学批评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典范的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文学批评有可能陷入贬低和危及文学价值的陷阱。

可见,作为一个美国法官和思想犀利的学者,波斯纳在这本书中所要确认的是文学批评的公共知识分子品性,要在文学批评和现代价值观念、政治思想和公共话语之间建立起深刻关联,避免文学批评仅作美学意义上的研究。客观地说,这本书是波斯纳为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唱的一曲挽歌,由于社会结构和现代大学专业化转型,苏格拉底那样的知识博通、融思想家与实践家于一体的公共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沦为了一些在波斯纳看来只会“舞文弄墨的空谈家”。因而,波斯纳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文学批评家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和功能,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他们绝不是一种模范、完美的人格类型,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公共知识分子批评可能会有的武断、极端与草率鲁莽。可以说,波斯纳在这本书中的学术思想有两点对我们极有启示,一是确认文学批评的公共知识分子品质和功能;二是学术知识分子在发挥学术和社会功能时,要警惕他们身上的缺陷和问题。

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文化语境里几乎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汇,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既不体现公正立场,也缺少为公共利益和正义事业奔走呼号的勇气和行动。他们表现出的那种玩世不恭、看穿但不说穿、没有立场、机会主义的嘴脸,使他们背负上了“犬儒主义的马屁精知识分子”<sup>②</sup>的骂名。但我并不悲观,我仍然相信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有犬儒的知识分子,就有正义的知识分子,有为利益和人情而写作的“寻美”批评或“抬轿”之文,也有体现批评正义的“冒犯”和“求疵”之作。我认同努斯鲍姆指出的文学是一种散发诗性正义的实践,同样,我理想中的文学批评也是一项散发着正义光辉的事业。一般而言,从功能意义上,批评可分为两种:寻美的批评和求疵的批评。寻美的批评是一种美学意义和文学价值的肯定性活动,是一种“审美的创造”,而不是“批评的分析”。蒂博代高度肯定的这种寻美批评本质上是一种“同情式”和“认同式”批评,体现的是读者和作者“两个意识的遇合”。法盖认为,寻美的批评是批评家面向读者说话,与读者分享古书或新书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求疵的批评是在面向作者讲话,他所进行的不是教育公众,而是试图教育读者。<sup>③</sup>在法盖看来,求疵的批评家更有用,因为他是真诚的“合作者”。当然这种真诚的合作者有时会是一个粗暴的、激愤的、略显偏激的批评者。对于这种批评者,蒂博代的评价是审慎而有保留意见的。蒂博代非常认可伏尔泰将职业批评家(教授批评)比作“猪舌检查者”,因为在职业批评家眼里,他们没有发现哪一个作家是健康的。这种对求疵批评家的比喻是颇为戏谑而带有讥讽意味的。综观蒂博代的观点,他对求疵批评本身并不反对,他反对的是那种没有诚意、自以为是、缺少真正建设性的求疵批评,反对那种以审判官自居的批评家,甚至以司法审判作为比喻空间,设定了批评家和诸多角色的身份:作者处于律师席,审判官的位置让给公众(而不是批评家),好的批评家应该像代理检察长。检察长的作用是进入诉讼双方及他们的律师内心,在辩论中分清真伪、摆平天平。

可见,蒂博代主张的是那种充满善意和真诚,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求疵批评,有时这种求疵的批评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见”。求疵者确实是一些唱反调的人,是一些拒绝合唱的人,他们不以

① [美]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第286页。

② 徐贲:《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232页。

③ [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25页。

颂美为主,而以诘问为责,他们不追求批评体系的大而全和观点的四平八稳,而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某种批评的“偏见”示人,求疵的批评常常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性和私人化的“偏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蒂博代看到了布伦蒂埃是一个有“偏见”的批评家,雨果的《论莎士比亚》也带有“偏见”,而且他对这种偏见给予了高度评价,“可是如果没有偏见,也就不会有批评和艺术了,一位批评家的偏见可以纠正另一位批评家的偏见。”<sup>①</sup>其实,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偏见未必都是错误或不合理的。伽达默尔将偏见分为“合理的偏见”和“盲目的偏见”,前者的认识偏差导因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后者的认识偏差来源于主观的盲目崇拜、知识结构的偏狭等方面,需要克服。别林斯基对那种怀有盲目偏见的批评家是尖锐贬抑的,他甚至将其称作“文坛上的蝗虫”<sup>②</sup>。在当下中国,充斥着太多貌似客观公允、四平八稳,实则取消判断和价值立场的文学批评,真正有效的文学批评不是这种形式规范、立场中规中矩的文学批评。我欣赏那种爱憎分明、充满正义、诚恳真挚的文学批评,这种文学批评往往彰显了某种“深刻的片面性”,是批评家的“真诚的偏见”,它以某种粗暴的形态出现,但它是建设性的,是文学的真正有意合作者,是切中文学流弊并勇敢言说出来的诤友而非媚者。

总之,文学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应该尽可能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姿态探求文学真相和内部秘密,揭示文学规律,评价文学现象,尤其敢于以求疵立场介入各种文学现象,这种介入看似冒犯显得粗暴甚至略显激愤,但它是善意而真诚的,是充满建设性的。它是对熟人社会出于熟人伦理大家都顾虑的作家病症、作品痼疾的介入,是对权力意志(比如文学体制、主流规范)、资本意志(比如商业利益、经费资助)对作家或文学形成的遮蔽或伤害的介入。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能真正体现其“寻美”和“求疵”的双重功效,才能彰显文学批评作为社会公器的正义品质。

## 二、文学批评是一种体现着批判理性的“及物”活动

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并不相同,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第四章对这几个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在我看来,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相比,文学批评在形态上较为自由,在体例上更为灵活。与文学史研究讲究结构谨严、注重将研究对象历史化、辨源头和考变迁式的严密论证不同,文学批评往往呈现出结构的随意化、阐释的选择性和主观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既是文学批评的优势,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人们对文学批评认识和实践中的误区,以为文学批评是批评的“意识流”:可以想到什么研究什么,随意布局学术结构,没有确定的学术指向,不需要明确的学术立场。

其实,文学批评是以文学现象作为批评对象,以问题作为导向,在鉴赏、分析和评价中体现着学术理性的心智过程。如果把这种复杂过程简化为一种随兴所至的活动,进而诉诸于文,可以想见,这种批评一定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这种写作也会成为空洞无物的“不及物”批评。别林斯基曾这样说过,“很多人把批评理解为或是诽谤所见到的现象,或是把现象中喜好和不喜好的东西区分开来——这是关于批评的最鄙陋的见解!在个人的喜好、信念和直觉上面,不可能肯定或否定任何东西:判断需要理性,不需要个人,个人应该代表人类的理性。”丧失了这种理性而固守自我,就会沦为别林斯基所讥笑的那类“不幸的病人”,“任何所谓我,只基于自己的感觉和意见、武断而毫无根据地判断着的我,会令人想起精神病院里的不幸的病人,他头戴纸做的王冠,庄严而成绩卓著地治理着假想的人民,判处死刑或宽赦,宣战或媾和。”<sup>③</sup>

这里,别林斯基所讲的“批判理性”,实际上是指批评主体进行批评实践时所具有的价值立场和精

① [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第109页。

②③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261、257—258页。



神姿态：拒绝非文学或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排除权力、利益、人情对学术评价的干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解释文学活动，彰显文学真相，尤其是以求疵和对话的姿态针砭文学与批评中的乱象与病象，维护文学的美好和批评的正义。由于写作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因而，我认同这样的观点：倘若我们不想让写作沦为一种任性而野蛮的权力，不让它沦为审美名义下的道德放纵，或商业动机驱动下的文化犯罪，那么，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在对作家的信任中就必须“掺和一些批判精神”，“存在一点的不信任”，或者换句话说，必须首先执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一种“高明的怀疑态度”<sup>①</sup>。说到底，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行帮化、圈子化、中庸化、去立场化，根本的原因在于批评主体批判理性的缺失。对于这种批判立场缺失、犬儒的知识分子类型，萨义德曾如此给予尖锐质疑——“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负责可靠的主流之内。”<sup>②</sup>

批判理性的缺失，会使批评实践回避批评家对作家应该有的善意和尖锐的质疑，拒绝对写作真相的追问以及对写作症结和各种病象的诘责，转而闭眼大唱不着边际的赞歌，或是抓住一些细枝末节与伪问题大做无用功。可见，缺失了批判理性，批评家没有能成为作家对面的那个必要的“敌人”，而成为作家的“护短者”“合唱者”。

我理想中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体现着批判理性的“及物”活动。文学批评应为彰显价值理性和解决学术问题的活动，那种既无立场又“不及物”的学术批评读来令人生厌。当前文学批评中有不少看似充满了各种“理性”和学术“问题”，实则“不及物”或是非理性的胡搅蛮缠，典型的有这样几种：

第一，“化简为繁”式义理叠加。文学批评应该有一种大道至简式的表达方法，文学批评天然具有文体和表达方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可用“短平快”、“多活新”概括。“短平快”是指，不需要长篇大论，容易写作，短时可以写好。“多活新”中的“多”是指形式允许多样，可以是对话体，可以是散论，可以是答客问，可以是书信体；活是指选择的角度能够灵活变化，选择性阐释（一个或多个）；新是指鼓励追踪学术前沿问题和最新现象。但在实际中，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尤其是当下文学批评，由于学术评价体制的量化要求和学术研究的崇奉西学心态，文学批评与研究体现为形式上的“化简为繁”和内容上的“义理充斥”。在目前学术评价体制之下，思想犀利篇制短小的文章并不具有优势，相反，那种洋洋大观的批评与研究文章倒是给人“厚重”之感和“学术”之气。当下，学院派的学者、教授以及学院毕业的博硕士研究生，他们的研究与批评路数在形态上都具有这种繁复的特征。在内容上，文学批评与研究更是被各种理论、思想、主义充斥。温儒敏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被各种义理（主义与理论）所充斥，比如革命、阶级、启蒙、救亡、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等，而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要么成为某种义理的例证，要么从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升华出义理。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由于诞生在一个更为开放和自由的语境里，这种义理充斥的现象更为普遍。“义理”的叠加伤害的是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功能，义理充斥的批评大多会远离文本，成为理论的跑马场。

第二，“邻猫生子”式的伪问题。梁启超曾用“邻猫生子”来指涉那些虽真犹假的问题：邻居的猫生了小猫，确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却与其他事情没有关系，是一个不能成为解释与其他事物发生关联的问题。由于批评文体上的繁复、诸多理论和概念的缠绕，假的学术问题常常会被绕成一个“真问题”，颇能唬人。这也是钱理群先生所讲的“吓人而迷人”的知识谱系带来的阅读效果。学者王彬彬曾这样描述此类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三绕四绕，把一个伪问题绕成真问题；五绕六绕，

①方宁主编：《批评的力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②[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84页。

把一个小问题绕成大问题；七绕八绕，把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绕成一个全新的问题，仿佛是自己第一次提出似的。在绕来绕去中，显得高深莫测。”<sup>①</sup>近两年，在对唐小兵、戴锦华、刘禾、黄子平等人的“再解读”进行批判的系列论文中，王彬彬对类似的批评路径和巨大危害作了非常精辟的概括和较为严厉的批评。

第三，“砍头割脚”式的阉割批评模式。以某种先验思想体系或理论框架来谈文学现象，对于与思想与理论对应的内容，大书特书，对于不能纳入的内容则视为末节和异端加以屏蔽（异质性内容）。因而，最终对作家或作品的解读，实际上是一种“剪刀加筛子”式的批评，用理论裁剪文本，用筛子筛选现象，留下的是适应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的内容。别林斯基对此有一个很贴切的比方，他说，批评家面对诗人时，目的在于“要他（诗人）去证实批评家先生们所规划的理论，——假如诗人的作品不是正好符合批评家的理论格局的话，批评家就要拖住作品的脚往外拉长，或者就把脚锯短（甚至把头砍去，看情况而定），不然就终于宣称诗人是渺小不足的，没有严肃的见解，落在时代后面了。”<sup>②</sup>这种“砍头割脚”式的文学批评也即张江在“强制阐释论”中所总结的“理论预设”、“观点前置”的批评痼疾。这种批评同样是极不善意、缺乏理性的文学批评，同样也必定是远离真正学术问题的“不及物”批评。

第四，“求全责备”式的错位标尺判断。这种批评模式是指批评者在评判研究对象时总是在不断变化价值标准，用多重标准去苛责对象。“一部作品呈现了A，他们会要求B，呈现了B，他们又要求A，如果同时呈现了A或B，他们会要求其他。”<sup>③</sup>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表现为：某个作家在艺术上有创新，批评家则怪他思想上不深刻；写了形而上学的哲理思考，苛求他没有通俗易懂的故事；体现了古典传统，会叹息不够现代；写了城市，说他不善于写农村。在这种研究中，批评家看似在理性献言，实则是非理性的刁难之词；看似语重心长，其实极不厚道。因为，批评家根本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没有能够根据批评对象的特点和局限进行针对性的评价，我们只看到一个手执多套评价标准的批评者，不断在苛责着作家或被研究对象少这缺那，在这种批评标准下，被批评对象永远是匮乏的、缺陷的、落后的、不值得肯定的。这种“求疵”是求全责备和非理性的无端指责，极不真诚，价值寥寥。

客观地说，上面这四种批评范式表现形式不同，批评的功效未必都是负面和无效的，比如“化简为繁”式批评，在研究和阐释学科重大问题，或是属于另立新说、考辨源流式的批评与研究时，这种批评范式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比如“求全责备”式批评，如果批评者目光犀利，切中症结，那么这种“求疵”式批评是必要的，也彰显了批判理性的魅力。但另一方面，要是这些批评范式远离了批判理性和真正的学术问题，仅仅满足于在批评活动中展示各种“主义和理论”，而不指向创作的真相、文学的症结和文坛的乱象，那么，这种批评即使具有思辨色彩和批判意味，也会沦为没有意义的“不及物”活动。对于别林斯基来说，理性是相对于武断、个人化、主观化而言的另一种精神品质和价值标准，我想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批判理性。文学批评固然是寻美和求疵两种功能相交织的实践活动，但在一个浮躁凌厉、病象百出的时代，文学显示出诗意和美好一面的同时，更暴露出它的诸多病症，因此，“求疵”以及与“求疵”同时的“批判理性”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然而，当前的文学批评由于意识形态、人情伦理、利益羁绊等因素呈现出种种令人不满的地方。有学者针对当前文坛现象，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总结了文坛的22条沉痾病象<sup>④</sup>，比如对事件和事物的判断力下降、创作中的反智化倾向越来越突出，批评家为体制与市场需求做吹鼓手和抬轿者、对消费伦理的靠拢与弃置正义或人性价值批评的流行、既拜体制的菩萨又拜市场的财神的“双料的批评家”的出现。如果说建国至二十世纪

①王彬彬：《应知天命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9页。

②〔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第269页。

③吴义勤：《原罪与救赎——读莫言长篇小说〈蛙〉》，《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④丁帆：《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

80年代中期,文学和批评较多的受制因素是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话;90年代以来,影响创作和批评的因素则是权力和市场。作为批评者,要抵制主体立场上的犬儒,抵制文学和批评论为权力与利益的工具,让文学批评在这个撕裂的社会成为一种散发理性的公器和及物实践。

### 三、高明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不低于”作家的对话,更是洞明的“问诊”

文学批评既是一种基于作品的个人化鉴赏和对文学现象的主观阐释,更是基于某种视角或理论,着眼于某个问题或某种症结的科学论证。在我看来,理想的、高明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不低于”作家的对话,也是一种俯视般的“诊断”。

若将研究者的修养、眼界与作家相比,可分为这样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研究者不低于作家,即“研究者 $\geq$ 作家或研究对象”,如果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阅读视野和理性认知超过研究对象,那么,这种批评很可能构成一种对话与问诊,即批评家能够准确、敏锐地指出作家及其创作中的得与失,美与丑,从而客观、科学地做出历史评价和学术定位。第二种是研究者低于研究对象,也即“研究者 $<$ 作家(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批评者对于作家作品一知半解、认知模棱两可,此番批评与研究很可能成为庸论、臆解,甚至胡扯。当前,不少研究者在知识和视野、审美与认知方面确实是低于作家的,但这种“低于”并不天然意味着批评家和研究者阐释或研究活动的无效性,每个读者都有权利展开自己的阅读和批评活动。这一活动是基于个体的审美旨趣、知识结构、评价体系而完成的,因而,面对同一个对象,不同批评者由于采用的视角、立场、标准、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这里,我所反对的是那种“一只眼批评”。什么叫“一只眼批评”?它表现为这样几种形态,第一种是选择性阐释,这种批评模式从方法论上看不是遵从“论从史出”,即从大量材料和文本中自然分析出问题,得出结论,而是强行将一个作品、对象从作家的作品谱系里或从复杂的历史语境里切割出来,作纯粹的“内部研究”,全然不管批评对象的历史承传与生成语境。第二种是简化性阐释。这种批评是批评主体对批评过程的简化,比如研究某部作品时,只知此部,不知其余;研究一个作家时,只知部分,不知全体;分析作家作品时,只知其文,不知其人;梳理研究成果时,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只知其一二,不知其全貌——这些批评模式都是在人为简化研究对象或研究过程,从而影响了批评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大时代的变动不居对作家和批评家同样提出了挑战,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回归现实和扎根中国大地成为这些年中国作家的一个主要写作向度。那么,在这种写作潮流面前,批评何为?我的总体看法是批评家滞后于这样一个文学现象,无论是理论资源、批评方法,还是学术见解,都远远没有说透当下中国这样一个现象级的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面对芜杂、丰富现实的召唤,都纷纷将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天地,文学的现实维度和作家的现实关怀在近些年与日俱增,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作家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性创作观——“当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问题将更加复杂,它将为文学又一次提供着更大的想象空间和丰富的素材……对于中国作家,那就得了解和熟悉当下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在观察着我们,我们以文学观察社会现实。”<sup>①</sup>正是由于丰富而芜杂的现实对作家的强大召唤力,现实成为最近这些年文学中的巨大存在。新世纪以来,余华的《兄弟》《第七天》、莫言的《蛙》、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贾平凹的《带灯》《极花》、苏童的《黄雀记》、阎连科的《炸裂志》、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韩少功的《报告政府》,等等,这个不完全的清单中的作品以不同的艺术形态呈现了改革时代和当下中国的现实情态。

问题是,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的这种群体性的现实主义写作潮流和现实美学?此处我想说的是,

---

<sup>①</sup>贾平凹:《命运决定了我们是这样的文学品种》,《当代》,2014年第1期。



批评家能否对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现象给予相应回应。这种回应不是盲目充当作家作品的吹鼓手,不是简单贴上“里程碑”、“伟大”、“最高水平”等太过宏大的标签或是呈上非理性的诋毁与谩骂之词,而是需要批评家基于文学史的发展视野、丰沛的中外文学阅读和敏锐深刻的理论自觉,从而对这种写作潮流的学术意义、发展瓶颈与内在困境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如何处理现实——如何让小说既立足现实又能超越庸常,既不乏现实的根基又能避免新闻化的呈现和简单的现实碎片堆砌,还可以让现实具有某种诗性和魔性——这似乎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命题,但恰恰是作家创作实践中需要直面的命题,也是批评家和理论家需要思考的命题。批评家在回应和评价当下作家的这种写作潮流时,应该让自己的理论库存和阅读行囊尽可能丰富和广博些,否则难以做出令人信服、较为准确的结论。具体而言,这要求批评家对中外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发展脉络有所了解,把握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因为,批评家的理论视野和文本阅读面决定了批评实践的有效性和穿透力。“一个批评家倘若满足于无视所有文学史上的关系,便会常常发生判断的错误。他将会搞不清哪些作品是创新的,哪些是师承前后的,由于不了解历史上的情况,他将常常误解许多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sup>①</sup>客观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这股现实主义小说潮流尚没有得到学理和深刻的研究。“现实”是令作家异常兴奋也很头疼的问题,“兴奋”是由于丰富而杂乱的现实为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写作灵感,令作家“头疼”是因为如何将现实写得不落入俗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余华说,“现实永远比小说更荒诞”,面对加速发展的社会,小说呈现的现实似乎远远不及现实存在那样有趣和五彩。因而,对于当下作家来说,如何在小说中“整饬现实”是一个颇有难度而又极其重要的问题。作家阎连科2014年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对当下作家的现实主义书写潮流评价颇低。他认为,当代作家的现实观和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基本上没有超越西方19世纪以巴尔扎克、狄更斯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就是说,尽管当下社会为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和丰富的现实,可大多数作家表现现实的手法并不比两百多年的那些作家高明。这一观点是否准确有待商榷,但阎连科基于中外文学的比较视野,对当下不少作家过于陈旧的现实观和较为拙劣的现实摹写的批评还是有其道理的。我想说的是,这一令作家头疼的“现实”主义写作问题,同样需要批评家给予理性批评和学理研究,然而,当前批评界对以下这类问题的批评和研究还较少: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为什么“现实”呈骤增之势?作家集体介入现实的动因是什么?与既往现实主义小说相比,这一时期作家的现实观和表现现实的手法有何不同?这些问题亟待批评家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理性的分析。而要使这种批评和研究能够有效且充满穿透力,需要我们的视野和认知,理论与素养能够接近甚至超过研究对象,只有“不低于”研究对象,我们与批评对象才能真正形成一种对话或“问诊”关系。

有研究者曾指出当前文学批评的症结所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根本症结,其实就是今天的文艺理论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今天的现实,根本就无法解释今天的文艺现象;而文艺批评由于在理论方面的严重滞后,甚至都没有能力去真正地鉴别出作品的高下。”<sup>②</sup>文学批评阐释力的下降不仅是由于文艺理论“落后于今天的现实”所致,也与批评主体理论水准偏低,缺少必要的专业素养以及狭窄的文学阅读有关,从而导致审美标尺单一、教条和评判结果失准。

在当前多元化的文化生活中,文学批评尽管参与着文学作品意义的阐释、生产以及传播,但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和引领社会公共话语的能力无疑在弱化和丧失,文学批评在当下急剧变革的大时代中甚至已经远离社会文化的中心而沦为学院派的一种私人性的知识技能。文学批评失去轰动效应及文化引领能力的这种“去势”和“失位”,除了与时代主题更替导致的文学和批评走向边缘有关,也与文

①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38—39页。

② 王彬、王春林等:《当前文学批评标准与方法》,《文学报》,2012年10月11日第4版。



学批评自身肌体的“病变”脱不了干系。也即,“文艺批评所能激发的公共性的思想和情感的能力在减弱,激发大众的共同激情和兴趣的力量在弱化,提供大众探索真理的路径和精神能量日渐匮乏,对于历史主体的创造性想象和未来信念在丧失。”<sup>①</sup>今天,当我们试图重提让文学批评回归文学现场,并积极介入公共话语空间,参与且引领社会公共话题、重大文化和社会事件时,我们首先应该从文学批评的反思与重建做起。所谓“重建”,我认为得从批评主体的人格重建开始,这种人格建构不仅是专业素养的提升和学术眼光的锻造,更是批评主体人格气质的重建,需要学院派知识分子唤醒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让正义成为文学批评家的精神气质,让“及物”成为文学批评的常识,让“宁实勿虚,宁拙勿巧”成为批评家的共识。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会“有力”和“有信”,继而才会“有位”和“有戏”。

#### 四、“我们”这一代:幸运的“80后”与不幸的“80后”批评

如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批评范式和批评气质。作为“80后”,我关注着“80后”在批评界的代际声音和代际形象。从总体来看,作为整体的“80后”在批评界尚未形成自己的批评肖像,自然也就没有确立起自己的代际气质。当前“80后”的批评还处于沉潜阶段,尽管少数几个“80后”批评者风生水起,但更多的年轻后生们尚在成长的路上。马克思主义批评大师詹姆逊指出,文学批评有三个主要研究对象,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者立场<sup>②</sup>。也即,对文学批评的反思,除了对批评对象和批评方法、范畴的反思,还应包含对批评者自我的反思,即对批评者的自我立场、价值理性和批评局限的反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自我在内的“80后”批评进行一种清理和审视——这种自我审视更多是对自我文学批评的一种总结和提醒。

“80后”是幸运的一代,成长于改革开放的伊始,这代人没有经历过文革以及此前的诸多历史动荡,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逐步深化,物质贫瘠与饥饿之虞基本和他们绝缘,政治动荡带来的生存焦虑也极为鲜见。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80后”所受的学校教育是完整的,他们的大学学习基本上是20世纪的最后两三年至新世纪初完成。这一代人读大学时,象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组织”观念已经日益松散,他们可以自由恋爱,内心没有政治恐惧,不用参加各种政治学习或是上街游行,能够读古今中外的各种图书,“禁书”在“80后”这儿是个遥远的历史词汇。可以说,“80后”是幸运的一代,他们从出生、成长到走向社会,一帆风顺、一马平川,没有遭逢父辈们的政治惊惧和物质之苦。“60后”作家曾自况说是“喝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的奶长大的”<sup>③</sup>一代,我不知道“80后”是“喝”什么长大的,“80后”可以“喝”的东西太多了,不同的人“喝”的东西都不一样,长成的样子也有别——如同“80后”所处的时代一样: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社会景观芜杂失序,伦理价值新旧转换,被时代风暴裹挟在漩涡中央的“80后”,即便他们如今已过而立,但要勾勒出这代人的清晰轮廓和精神肖像似乎不易。肖像的模糊缘于精神气质的孱弱。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从大的趋势来看,在“50后”(包括“30后”“40后”)“60后”“70后”“80后”这一代际年轮上,个人的责任感、使命感经历了从强到衰的过程,而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呈现出从紧密到疏离的递减态势,我无意于分析这一趋势所包含的复杂历史背景与得失优劣。我感觉到,极左年代的政治乌托邦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竞争与发展意识,逐渐涤荡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宏大理想、集体情怀和社会使命感,人们的价值观与精神诉求转而和物化、世故、精明、实用联系在一起,人们对社会和国家

①张永禄、王杰:《文艺批评是公共话语的引领者》,《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②杨建刚:《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吸收和借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③艾伟:《无限之路》,林建法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49页。

的热程度降低,对个体的关注升温。“80后”是“精神缺钙”的一代,他们聪明,机警,看似天真,实则极有城府,茅盾所说的“卑谦的利己主义”和钱理群先生概括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与他们的某些气质不谋而合。

“不冒险”是“80后”文学批评的总体特色。为什么“不冒险”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气质?我想,在生存利益和严苛的学术体制面前,“80后”批评家们早已熟悉并能自如驾驭学术江湖的种种游戏规则:他们有些人把文章写得不温不火,不偏不倚,不是他们没有棱角和爱憎,而是不愿意做出头鸟或诤诤之士;他们依附于体制,游刃于各种学术会议与学术奖项,善于获取各种资助项目和学术头衔,书读得不多,文章写得不少,新颖观点和深刻洞见不多,繁复理论和“绕脖子”的叙述倒是令人望而生畏;在利益纷争的学术江湖,年长的早已人情练达,年轻的也已未老先衰,精明世故:面对选题和学术文章,深谙短平快小文和学究气雄文的制作之道,面对学术争鸣,未下笔前早已掂量了学派、师承、门户,该不该讲,如何讲,分寸感十足;面对各路期刊主编和学术大咖,竭尽恭维,奉如神明;精于积累经济资本(各种立项和获奖)和社会资本(各种客座教授或头衔)。在学术体制、市场利益和熟人伦理面前,显得少年老成,左右逢源。“80后”的学人是被学院体制养大,被学术体制圈养的一代,虽没长大,浮躁、偏狭,“精致利己主义”和“卑谦利己主义”的气质已然若现。不要指望“80后”能出大师,这代人知识结构残缺、学术功利心强烈,这代人专业水准精深,但缺少博通,这代人的学术也许会呈现“片面的深刻性”,但这代人的学术声音大概行之不会久远。

“80后”的文学批评存在这样一些显见的“硬伤”。第一,残缺的知识结构和偏狭的学术视野。“80后”批评家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是不健全的。他们的高中时代便开始文理分科,到了大学,尤其是博硕士阶段的教育,更是在学科和专业分工极度精细化的教育体制下完成的,学科分工和专业领地意识造成了学科壁垒,影响了受教育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既有国学功底,又通西学的学术大师群体在当代几成绝响。如今的批评者中,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懂自然科学,研究文学的不懂经济,不看历史,无视政治,不屑于宗教;研究中国文学的不懂外国文学,不看外国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的不看现代文学;甚至研究小说的不看诗歌、散文。“80后”批评家这种残缺的知识结构和偏狭的学术视野更为明显,由于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学制的短暂,在本应广博涉猎各个学科和专业书籍的阶段,匆忙应付多种应试考试或是学术考核,等到独立开展研究或是教学时,学院化的种种严苛的考核指标开始转化为新一轮学术焦虑,在这种焦虑心态之下,由于知识面偏狭,阅读量很小,只能以有限的阅读支撑“多快好省”的学术生产。也就是说,科层教育造成了学科壁垒和专业隔膜,从而造成了研究者的“圈地”意识和“领地”意识,过于精细的专业意识必然带来研究视野的狭窄和学术空间的逼仄。可以说,“80后”是在还没有做好知识储备和学术积累的情况下被赶往学术场域的,他们知识结构的完善和学术视野的拓展需要在后天的学术实践中完成,但当下“80后”的写作肯定不是最好的时期。

第二,花哨的知识外衣和贫瘠的思想内底。“80后”的学术生产点缀着各种“知识”和“理论”,他们的学术生产可以看作是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理论家的一次次“理论旅行”。由于很多“80后”并非英语科班出身,对这些理论大多是“二道贩子”式的借鉴和引用,他们论文里出现的不少理论均属生吞活剥、摘章引句型。理论是颇具魅力的一种话语力量,在当下学术批评和学术研究充斥着各式理论背景下,“80后”批评难以摆脱这种负面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运用这些西方新理论去评论中国作品的‘新批评家’就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这些‘遗传基因’甚至明显地体现在某些‘80后’批评家身上。”<sup>①</sup>在“80后”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主义”“理论”和花哨的名词,这些繁复的名词

<sup>①</sup>丁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生态及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文艺研究》,2015年第10期。

和晦涩的专业术语是“80后”学术批评的一种外在特征,拨开云山雾绕的词语堆砌,我们看到的却是贫瘠而苍白的思想。

第三,被规训的学术套话和功利化的学术伦理。“80后”批评家们置身的是一种严苛的学术体制,量化的考核标准、残酷的淘汰机制和巨大的竞争压力让初出茅庐的“80后”不敢懈怠,老一辈学者那种“板凳愿坐十年冷”的学术心态杳无影踪,学术评奖、职称晋升、项目化生存萦绕着他们。这种学术体制也塑造着“80后”的学术心态和学术生产方式。在学术江湖还没有立足的学术“青椒”们,整日思量的不是如何弥补自我的知识结构、进行学术方法的更新和学术传统的传承,而是揣摩哪个课题容易攻克下来,填报和制作各种优秀成果奖或是荣誉称号所需要的繁冗表格和材料,打听某次学术会议有哪些专家出席自己是否要去参加,哪个A类刊物容易发论文,职称评定要求的海外留学我该去往哪所学校……大学“青椒”们并不轻松,他们疲于填报各种表格和承担来自单位(或教研室)加诸于年轻人的一项项日常琐事,他们在高房贷的压力和嗷嗷待哺孩子的召唤下,无心坐冷板凳,他们只想早点评上副教授和教授,早点成为他们导师那样衣食无忧、体面威风的学者。这代人的压力太大,诱惑太多,不要指望他们的学术能够传世,他们的学术只是生存的筹码,他们的学术只想照亮当下而不奢望传世。我不看好这代人的文学批评和学术实践,不是因为这代人不勤奋和不学无术,而是因为这代人的“阿克琉斯之踵”是那样致命而脆弱:大时代里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学术仅仅是他们为稻粱谋的职业和工具而已,急功近利的学术体制和数字化的评价体制密不透风地塑造着这代人的学术面貌和学术气质,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是“80后”无师自通的两种意识,无根的学术是这代人的宿命——也许我过于悲观,我希望这种悲观的顾影自怜是多余的。

(责任编辑:邓晓东)

## Justice and Concrete Analysis: A Reflection on What Literary Criticism is and the Current Dilemma

SHEN Xing-pei

**Abstract:** The defining attribute of good l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be just and concrete analyses. In other words, good literary criticism is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looking for beauty, but also the activity for people to find fault, which can be offensive sometimes but reflect the critical rationality of intellectuals. It is also the activity that embodies the sense of justice which should be pursued by the intellectuals, and it is a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in which the critics can share level playing field with their objects. This is the quality and aspect that should be possessed by good, effective literary criticism in my understanding. At present, we have a lot of popular but empty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can be put into four major categories: the first type tends to be a mixture of various kinds of theories and “-isms”, which make a simple issue unbearably complex; the second one usually focuses on a pseudo-issue which contains little substance; the third one can be called “castrated criticism”; and in the fourth form the critics act more like a nitpicker. A common feature shared by these typ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is that they seem to be full of all kinds of “sense” and “issues”, but actually they are empty talks with little reason and substance.

**Key words:** justice; concrete analysis; public intellectuals;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post-80s generation